

中国徽商小史

王世华 著

中国徽商小史

王世华 著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百年徽商资料整理与研究》（编号138ZD008）阶段性成果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徽商小史 / 王世华著. —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107-0819-0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徽商-商业史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46207号

中国徽商小史

王世华 著

出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 (100006)

网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 capress@163.com

发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

电话: (010) 85099947 85099948

印刷: 北京骏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 × 1168mm 32开

印张: 9.5

字数: 130千字

印数: 3000册

版本: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7-0819-0

定价: 29.80元

目 录

壹	走出丛山 —— 徽商的兴起	···001
贰	血缘地缘 —— 商帮的黏合剂	···014
叁	如日中天 —— 徽商的鼎盛	···021
肆	无货不居 —— 徽商经营的行业	···033
伍	贾而好儒 —— 徽商的特点	···076
陆	钱势之交 —— 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	···088
柒	利以义取 —— 徽商的商业道德	···109
捌	古道热肠 —— 徽商倾心公益事业	···137
玖	文化酵母 —— 徽商对文化的贡献	···153
拾	仰事俯育 —— 徽商妇的贡献	···253
拾壹	风云突变 —— 徽商的顿挫	···271
	主编絮语 吉霞	···298

壹 走出丛山 ——徽商的兴起

一、徽州的自然环境

所谓徽商，是指明清时期徽州府六县的商人所结成的松散的商帮集团。那时的徽州府在明代属于南直隶管辖。明初朱元璋建都应天（今南京）后，将应天府、苏州府、凤阳府等十四个府和州划为直隶区（永乐迁都后改称为南直隶），面积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安徽和上海，是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徽州府只是其中的一个单位。当时的徽州府下辖绩溪、歙、休宁、黟、祁门、婺源等六县，徽商就是这六县的商人。

从地图上看，徽州府地处万山丛中。这里重峦叠嶂，烟云缭绕，溪水清澈，林木葱茏。徽州总面积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相当于一千八百余万亩，可是这些土地大多是崇山峻岭，真正的可耕地却很少。这里没有成片的耕地，人们只能在山坳之处，艰难地垦辟出零零星星的薄田。有的就在山上

垦辟梯田，但十余级梯田加起来还不足一亩，所以这里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谚。但就这可怜的“半分田”也不是旱涝保收之地。由于山高难以蓄水，十日不雨，土地便旱得龟裂，人们只得仰天而叹；可是等到一场骤雨过去，山洪暴发，其粪壤之苗又被冲得荡然无存。

耕地如此之少，且因地理条件的限制而难以扩大，土壤又是如此之恶劣，人们的生存环境真是够差的了，但人口却不断增加，所以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汉代以前，徽州这块土地只生活着一些土著居民，史称山越人。此后一千多年中，北方由于政局动荡，民不聊生，中原人口不断地迁来这一地区，使这里的人口骤增。这一期间，中原人口大规模迁徙就有三次。第一次是西晋永嘉年间（三零七～三一三年），此前由于晋惠帝的无能，外戚专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迅速激化，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互相残杀，终于酿成“八王之乱”（二九一～三零六年）。十六年的统治阶级混战，无数老百姓死于战乱，正常的社会生产已无法进行，于是中原的人们大量南迁，一些强宗大族往往举族迁徙。南方何处是桃源？徽州正是理想之地。这里崇山峻岭，兵革难至，当时人口还不多，

所以这一时期北方不少大族移居到徽州和南方其它地区，跟随他们南来的还有不少乡党、部曲和佃客。史称“永嘉南渡”。这次移民浪潮使徽州增加了不少外来人口。

第二次移民浪潮发生在唐末。北方由于“安史之乱”爆发，又遭受了八年的兵燹之灾，很多地方又成一片焦土，人民死伤无数。为了避乱，中原人口又纷纷南迁，不少也是落户于徽州。

第三次移民浪潮发生在北宋末年。一一二七年的靖康之变，金兵攻克北宋首都汴京（今开封），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大批皇室成员成为俘虏。宋室南迁，定都杭州。北方大批土地沦于金人之手，为了逃避女真统治者的蹂躏，北方又有不少人口陆续再一次向南迁徙。

这样，徽州的人口不断增加。据历史记载，明初徽州人口已超过五十万了。当人口增加到土地难以养活的程度时，人口资源就会变成沉重的人口负担，从而造成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明清时期的徽州就是这种状况。

由于土狭人稠，田地又贫瘠，产量极低。据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记载：在徽州，壮夫健牛，每天不过耕种数

亩，花在土地上的投入超过其它地方一倍以上，而劳动所获又只有其它地方的一半，所以本地农田所产是养不活本地人口的。他说，在徽州“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十之一”。意思是说，一年的收获，一个多月就吃完了，所以每年都要从邻省江西和浙江运来大批粮食，才可勉强维持这里人们的生存。好在江西饶州的鄱阳（今江西鄱阳）、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以及浙江的杭州、严州（今浙江建德）等地，与徽州毗邻，溪流一线，小舟如叶，运粮之船，鱼贯尾衔，昼夜不息。据当地的官员向皇帝报告说，如果一天粮船不到的话，百姓就要挨饿，三天粮船不到，就会有饿死人的现象，五天粮船不到，就会发展到白天抢劫了。因此，粮食问题一直是徽州百姓面临的严峻问题。

显然，农业这条路已经越走越窄，要想生存必须另谋出路。

二、乘时而起

在封建社会，国家承认的正当职业是士、农、工、商。士，就是发愤读书，通过科举入仕做官。走这条路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成功的几率极小。更何况走这条路是要有雄

厚经济基础作后盾，饥肠辘辘总无法安心读书的，所以对徽州人来说，这条路行不通。农，如上所述，越走越窄。工，在封建社会还没有现代工业，只有手工业，而那时的手工业又很不发达，可容纳的劳动力极其有限，此条路也很难走。剩下的只有一条路，这就是经商。所以说，正是徽州人多田少、难以为生的窘况，迫使大批徽州人走上了经商之路。

从外部原因来看，明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徽商的崛起创造了一个好的外部环境。没有这一条件，任何商帮也是难以形成的。

明王朝是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蒙古贵族的统治下，元朝末年，社会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因此，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大力发展社会经济。首先，他以空前的严厉手段，处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兴起了一场廉政风暴。既在政治上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又为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采取了移民屯田、开垦荒地的农业政策，积极鼓励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第三，推行了一系列诸如减轻商税、放宽对工匠的限制、统一钱币等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因此，明初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朱元璋死后，后继的几位皇帝也基本上能遵循

祖制，继续发展社会经济，所以经过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明代中叶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首先是社会分工进一步强化，区域性农业经济开始出现。粮食生产同棉花、蚕桑、甘蔗、染料、烟草等经济作物生产分离的趋势日益加快。如湖广地区，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向以“田多而人少”著称，于是河南、江南和江西的人口纷纷移居湖广，大力进行农田开发，使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又积极兴修水利，一大批水库、沟渠、堤垸等水利设施得到修建，有力地保证了农作物的收成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加上山区又不断得到开发利用，所以湖广地区粮食产量大增，以致长江下游各地的粮食供应竟依赖于湖广。从明代天顺年间（一四五七～一四六四年）开始流传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来看，湖广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大粮仓。与此恰恰相反，过去号称“苏湖熟，天下足”的苏州、湖州一带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早已失去了天下粮仓的地位，而成为蚕桑、棉花的重要经济作物种植区。例如湖州地区非常适宜种桑，而种桑又比种稻获益多。当时人曾算了一笔账：“蚕桑之利没有超过湖州的，大约良田一亩，若种桑可得叶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一个），一年的垦锄

壅培费用，大约不过二两白银，但出售桑叶却可卖得四两白银以上”（徐献忠《吴兴掌故集》），远远超过种稻所得，所以这里的人们纷纷弃稻种桑、养蚕。而苏州府、松江府等地，农民又将稻田改为棉田，大量植棉，从而成为主要的产棉区。河南、山东棉花种植也很普遍。福建、广东则遍种甘蔗，因为人们计算过种水稻的利润还不及种甘蔗利润的一半，所以人们纷纷弃稻种蔗，从而出现蔗田与稻田争地的现象。还有一些地区以种植荔枝、龙眼为业。区域性农业经济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大规模的区域贸易。

其次，是手工业专业区逐渐形成。随着手工业的不断进步，手工业品的产量和质量也不断提高。当从事手工业的利润大于务农利润时，社会不断吸引着人们从农业转到手工业上来，从而形成各有特色的手工业专业区。当时在全国各种各样的手工业专业区很多。如松江就是全国著名的棉织业中心，松江府属太仓县棉花八月成熟，九月南方的贩客就来此收购棉花了，所以城中的男子多以轧花为生业。棉花的种植又带动了纺织业的兴盛，不少人又专门从事纺织业。松江的棉布不仅产量多，而且质量好，以致行销全国，享有“衣被天下”的美誉。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南方则推苏、松、杭、

嘉、湖五府。苏州的丝织业在明初就发展起来了。开始只集中在郡城，后来丝织业扩大到农村小集镇，很多人都从事丝织业的生产，有的地方甚至家家户户都工于织作。山西潞安则是北方丝织业中心。此地所产潞绸闻名天下，这里从事丝织业的则有几千家。江西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又是全国瓷器制造业的中心。这里不仅官府建了大量的官窑，民间也有大量的民窑。工匠们在这些官窑、民窑中夜以继日地劳作，“杵声动地，火光烛天”，被人们称为“四时雷电镇”。此外，广东南海县的佛山镇、陕西华州及其所属的柳子镇则是有名的冶铁铸造业中心，浙江崇德县石门镇则是东南榨油业中心。这些手工业专业区生产出来的商品无疑都要投向市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三，城镇经济走向繁荣。明初，全国的城市政治意义还比较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经济色彩进一步凸显，甚至出现了不少纯粹工商型的城市。当时的著名城市除北京、南京以外，还有江、浙、闽、广诸省的省会，再就是苏州、松江、扬州等地，共有三十多个。北京的繁华自不必说了，南京作为明初的都城，当时已有二十四万人口，四方商贾集辏，商货堆积如山，政府特盖几十间“塌房”，供商人

存放货物。永乐十九年，明朝将都城迁到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经济虽曾一度受到影响。但这里地处南北要冲，长江之滨，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明中叶又呈现出“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南北商贾争赴”的景象。苏州，在元末明初一度衰落，但这里交通发达，土地肥沃，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渐繁荣。到了万历年间（一五七三～一六二零年），苏州已成为“大都会”。杭州，作为东南重镇，已成为四面八方商品的集散地：浙江宁波的竹木，苏州的谷帛，山东河北的枣栗，四川、福建、广东的珠玑、犀象、玳瑁等瑰奇之物，在这里海汇山积。由于这里的丝织业闻名遐迩，富商大贾纷纷聚集这里，呈现一派繁华景象。

广州、漳州、泉州、宁波等港口，是对外贸易的口岸，每年都有不少外国商人携带各种货物来到这些港口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广州的手工业也十分发达，甲于天下的“广纱”、佛山的铁器、石湾的彩釉陶瓷以及各种果品海珍，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各地商人来此交易的很多。漳州府龙溪县的月港，距离府城四十里，负山枕海，居民数万家，绝大多数人家都从事私人海外贸易，是东西洋贸易的重要口岸，时人评说其繁华程度，堪称闽南大都会。在对外贸易的刺激

下，漳州的手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如纱绢、丝织品、天鹅绒等，均十分闻名，使漳州城成为一个重要的手工业城市。

除了上述这些大型的工商业城市外，在江南一带，众多的市镇也在明中叶勃然兴起。如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明初只是一个仅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邑。到了成化年间，“居民附集，商贾渐通，后遂成镇”。黎里镇此时也成为“百货并集”的县中“巨镇”。湖州府的乌青镇，明中叶由于连年丰收，获得迅速发展，“负贩之广，耕桑之勤，又日盛一日”。菱湖镇这时也是“第宅云连，蔚为冠盖”。它与南浔以及嘉兴府的石门，都是产丝的著名市镇。

第四，区域间的贸易愈益加强。由于区域农业经济的形成以及手工业专业地区的出现，互通有无的区域贸易也就随之发展起来。如北方虽广为植棉，但织布技术较差，必须仰赖南方的棉布。南方虽精于织布但棉花供应不足，又要依赖北方，“故棉则方舟鬻于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长江下游一带，由于经济作物增多，粮食作物减少，又必须仰仗湖广所产稻米。北方所产的大豆、小麦，南方所出的海货、特产等等都需要寻找全国的市场。这样南北东西的物资交流便日益频繁。明人李鼎是这样描述当时全国区域间的贸易往

来的：“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李长卿集》）显然，全国范围内商品大流通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一切将给商人的长途贸易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第五，白银成为普遍使用的货币。明初，政府为了巩固自然经济，曾禁止民间交易使用白银。但自宣德（一四二六～一四三五年）以后，这一禁令逐渐被打破，白银的使用范围日益扩大。不仅民间交易用银，赋税也相继折银缴纳，官员的俸禄也主要发放银两。这一变化，大大地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因为赋税折银交纳，迫使生产者必须更多地出售劳动产品，换回银两。大批产品投放市场，在当地难以消化，势必要寻求更广阔的市场，从而又促进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尤其是为了纳银完税的农民往往为时限所迫，对自己的产品不能待价而沽，有时不得不忍痛降价抛售，人为地造成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的背离，这又给商人牟取厚利提供了可乘之机。市场的活跃和扩大，经商的有利可图，加速了商人的勃兴。

国内的大环境为商人的崛起提供了客观条件，但为什么

同样的客观条件，其它地方就没有像徽州那样兴起一个大商帮呢？这就取决于徽州人的主观条件了，也就是说，徽州人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

一是徽州人特别能吃苦。徽州是个山区，山区的生存条件自然要比平原或水乡艰难得多。然而正是这种艰难的生活造就了徽州人比其它地方的人们特别能吃苦的品格。正如宋代淳熙《新安志》说：“其山挺拔廉厉，水捍洁，……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徽人出门经商，往往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为什么他们能够克服，决不退缩，就是由徽人的这种品格决定的。不仅男人如此，徽州妇女也一样。乾隆《歙县志》载：“女人尤号能俭，居乡者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之所以“女人尤号能俭”，这也是徽州恶劣的自然环境长期塑造的结果，已成为她们品格中的一部分了。

二是徽州人有文化。南宋大儒朱熹是徽州人，他特别重视教育。在他的影响下，从南宋开始，徽州就形成了重教兴学的好传统，乃至“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就是说哪怕只是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落，也会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孩子从小就读书学文化，待到十三四岁时，就已掌握了中国传统

文化中最基本的内容了。

徽州流传这样的谚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包袱雨伞，夹着就走。”由于在家受到艰苦的锻炼，外出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也就能够克服了。学徒期满后独立创业，同样也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习惯。徽州人的这种习惯被当时的文人视为“吝啬”，并编入笑话之中。

徽州人不仅能吃苦，而且有文化。有文化就能提升自己的素质，去除商贾身上的铜臭味；有文化就能准确地判断商业形势，较少失误；有文化就能从中国历史上汲取更多的经商经验，指导自己的经营活动；有文化就能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消除彼此之间的鸿沟，获得更多的支持，更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此外，徽州人与众不同的还有一样，就是徽州的宗族制度特别牢固，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内容。